

藍吉富 主編

大藏經

經補編

補編

8編

(26)

卷之九
卷之九

華南出版社

大藏經補編

26

(全三十六冊)

主編：藍吉富

出版者：華宇出版社

發行人：朱蔣元

版權請勿翻印

社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電話：(02) 9426674 • 2477372
定價：新台幣五四〇〇〇元(全套三六冊)

(郵運費另計)

郵政劃撥：○○一七六二五一三號朱蔣元帳戶

佛曆二五二八年十月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編輯說明

本冊共收集五部書，各書都有頗為引人注目的特色，茲略介如次：

「房山雲居寺石經」是石刻佛經的拓片集。房山雲居寺石經，為隋代沙門靜琬所創始，歷經唐、遼等朝代，迄明代為止，都有人斷續地刻造。此一刻經偉業，從宗教角度上可以看出崇高的護法精神，在學術上也留下了甚多可供校勘的石刻經本及若干為後代藏經所不收的珍本佛典或題記，甚為珍貴。

此處所收只是房山石經的一小部份，為若干經文、題記、碑銘的選輯。卷首的「房山雲居寺石經」一文對此一刻經事業及房山石經的價值有詳細的說明，是一篇很好的導論，請關心石經的讀者不要錯過。由於編者根據的「房山雲居寺石經」一書，是坊間印行的影印本，未署編者，因此不知編者為何人。近代學者林元白氏，精研房山石經，不悉此書是否即為林氏所編？

「三階教殘卷」是我國隋唐時期佛教宗派之一——「三階教」的根本資料，內含敦煌出土與日本所藏兩部份。這兩部份都是本世紀研究三階教而飲譽國際學界的日本學者矢吹慶輝所收集的。有關三階教的特質、典籍，及創始者信行禪師的風格等，請參閱該書卷首所附諸文（一九五頁—二一八頁），此諸文皆為「大藏經補編」編者之舊作，錄之於此，以供讀者參考。

「東坡禪喜集」輯錄的是宋代大文學家蘇東坡的佛教著作。東坡居士與佛教的關係，膾炙人口，頗為後人所樂道。加上其人在文學史上具有顯赫的地位，因此，此書之出，不僅可供談助，而且也是治佛教文學史者所可採擷的資料。

「鳴道集說」為金朝進士李屏山所撰，「道餘錄」的作者是明代曾經為僧的姚廣孝。此二書都是對儒者評佛言論所作的反駁或批評。在我國的儒佛思想關係史上，此二書都有一定的價值。尤其是李屏山的思想，已經廣泛地被國際學術界注意，其人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國人似有重加評估的必要。

目次

一、房山雲居寺石經	——經文、題記、碑銘等拓片之選輯
(一)、原書目次	三
(二)、房山雲居寺石經說明	九
(三)、圖版	四三
(四)、圖版說明	一〇五
(五)、房山雲居寺石經簡目	一三〇
二、三階敎殘卷	
(一)、小引	一九一
(二)、三階敎典籍略介	一九六
(三)、敦煌本「三階佛法」表解	二〇一
(四)、信行與三階敎	二〇五
(五)、敦煌出土三階敎殘卷	二一九
(六)、本邦（日本）所傳三階佛法	四七三

三、東坡禪喜集

徐長孺輯

六三七

- (一) 頌

六五七

- (二) 賛

六七一

- (三) 喻

六九七

- (四) 銘

七〇七

- (五) 記

七二一

- (六) 書諸經後

七三七

- (七) 序傳文疏書

七四五

- (八) 禪喜紀事

七五五

- (九) 佛印問答語錄

七七一

四、鳴道集說

李屏山

七九九

五、道餘錄

姚廣孝

八九三

房山雲居寺石經

目 錄

房山雲居寺石經

圖版

- | | |
|---------------------|----|
| 一 唐刻 貞觀二年靜琬題刻 | 三五 |
| 二 唐刻 靜琬涅槃經堂題刻 | 三五 |
| 三 唐刻 貞觀八年靜琬題刻 | 三六 |
| 四 唐刻 總章二年玄導刻經題記 | 三六 |
| 五 唐刻 大唐雲居寺石經堂碑 | 三六 |
| 六 唐刻 大方廣佛華嚴經世間淨眼品第一 | 三七 |
| 七 唐刻 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 三八 |
| 八 唐刻 大般泥洹經序品第一 | 三九 |
| 九 唐刻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 三九 |
| 一〇 唐刻 四分戒本、心經、觀世音經 | 四〇 |
| 一一 唐刻 勝天王般若經卷第一 | 四一 |
| 一二 唐刻 勝天王般若經卷第七 | 四二 |

一三	唐刻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序、序品第一、碑側題記	四三
一四	唐刻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知識品	四四
一五	唐刻	思益梵天問經卷第一	四五
一六	唐刻	佛地經	四四
一七	唐刻	金剛經、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四七
一八	唐刻	佛說阿彌陀經、大通方廣懺悔滅罪莊嚴成佛經卷中	四八
一九	唐刻	大方廣佛花嚴經卷第一	四九
二〇	唐刻	佛說藥師經	五〇
二一	唐刻	佛說造立形像福報經	五一
二二	唐刻	佛說恒水流樹經、摩達國王經	五一
二三	唐刻	梵網經盧舍那佛所說心地品第十	五三
二四	唐刻	梵網經盧舍那佛所說心地品第十	五四
二五	唐刻	梵網經盧舍那佛所說心地品第十	五六
二六	唐刻	正法念經卷第七十	五五
二七	唐刻	大方等大集經卷第三十	五七
二八	唐刻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	五八
二九	唐刻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	五九
三〇	唐刻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九	六〇

三一	唐刻	妙法蓮華經序品、方便品	六一
三二	唐刻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譬喻品	六二
三三	唐刻	妙法蓮華經化城喻品、五百弟子受記品	六三
三四	唐刻	妙法蓮華經見寶塔品、勸持品	六四
三五	唐刻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百五十九	六五
三六	唐刻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百六十	六六
三七	唐刻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百三十九	六七
三八	唐刻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百四十二	六八
三九	唐刻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一	六九
四〇	唐刻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一	七〇
四一	唐刻	大佛灌頂經	七一
四二	唐刻	大佛灌頂經	七二
四三	唐刻	盧至長者因緣經一卷并贊	七三
四四	唐刻	善恭敬經、勝光天子說王法經	七四
四五	唐刻	善恭敬經、勝光天子說王法經	七五
四六	唐刻	瓶沙王五願經	七六
四七	唐刻	瓶沙王五願經	七七
四八	唐刻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造塔功德經	七八

四九	唐刻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造塔功德經	七九
五〇	遼刻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三	八〇
五一	遼刻	善思童子經卷下	八一
五二	遼刻	善思童子經卷下	八二
五三	遼刻	持世經卷第一	八三
五四	遼刻	賢劫經卷第一	八四
五五	遼刻	賢劫經卷第一	八五
五六	遼刻	大方等陀羅尼一	八六
五七	遼刻	發菩提心戒一本	八七
五八	遼刻	清淨觀世音菩薩普賢陀羅尼經	八八
五九	金刻	底哩三昧耶不動使者念誦品	八九
六〇	金刻	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序	九〇
六一	金刻	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序	九一
六二	金刻	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卷第三十	九二
六三	金刻	大藏教諸佛菩薩名號集序	九三
六四	金刻	大藏教諸佛菩薩名號集序	九四
六五	明刻	法寶壇經贊	九五
六六	明刻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六、三十七	九六

圖版說明

九七

房山雲居寺石經簡目

一一一

房山雲居寺石經

房山雲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經（略稱房山石經），是我國從隋代至明末綿歷千年不斷刻造的石刻寶庫。它是研究我國古代文化、藝術，特別是佛教歷史和典籍的重要文物，也是世界一宗寶貴的文化遺產。關於房山石經在文化史上的價值，早已引起海外學者的重視和研究，然而由於過去傳世的經碑數量極少，大部分石經錮藏在石洞和地穴內，因此要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是不容易的。

石經創造沿革

我國石刻佛教經典始於北齊。如山西太原風峪的《華嚴經》、山東泰山經石峪的《金剛經》、徂徠山的《般若經》等，都是北齊時代的石刻佛經。北齊的唐邕自天統四年至武平三年（西元五六八—五七二年）在今河北武安縣北響堂山（即石鼓山）刻了《維摩詰經》、《勝鬘經》、《彌勒成佛經》等許多佛教經典，並且留下有名的《鼓山唐邕刻經銘》，歷敍發願刻經的原因，所刻經數及開刻起訖年月。這些石刻佛經，特別是唐邕鐫刻石經的事業對後代佛教徒從事大規模的石刻佛經有很大的影響。

房山石刻佛教大藏經始於隋代，創始人爲僧人靜琬。靜琬是北齊時天台宗二祖南岳慧思大師的弟子，他的詳細身世和事跡已不可考，但創造佛教石經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事業，這是可以肯定的。從隋大業中一直到他死時爲止，約三十年時間，他的創造佛教石經事業從未間斷。關於靜

琬發起刻造佛教石經的文獻記載，最初見於唐初唐臨所著的《冥報記》中。《記》云：

『幽州沙門釋智苑（按：即靜琬），①精練有學識。隋大業中，發心造石經藏之，以備法滅。既而於幽州北山，鑿石爲室，即磨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磨寫，藏儲室內。每一室滿，即以石塞門，用鐵錮之。時隋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之同母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及餘財物以助成之，瑀亦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遂其功。……苑所造石經已滿七室，以貞觀十三年卒，弟子猶繼其功。』

唐臨《冥報記》著於唐高宗永徽年間，在有關房山石經記事部份之末，唐臨自注說：『殿中丞相李玄獎（一作『奘』）、大理丞采宣明等，皆爲臨說云爾。臨以十九年從車駕幽州，問鄉人，亦同云爾。而以軍事不得（往）云。』這是說，唐臨早在長安就從兩位同僚中聽說過幽州釋智苑刻造石經之事。貞觀十九年（西元六四五五年）他隨同唐太宗到幽州，問了當地鄉人，也同樣說是如此，只因軍事繁忙，未能親往調查。

又，據《寰宇訪碑錄》著錄，唐元和四年（西元八〇九年），幽州節度使劉濟所撰之《涿鹿山石經堂記》亦記有靜琬創刻石經之事：

『濟封內山川，有涿鹿山石經者，始自北齊。至隋，沙門靜琬，睹層峰靈迹，因發願十二部石經，至國朝貞觀五年，涅槃經成。』

靜琬爲什麼要發願刻造佛教石經呢？佛教自東漢明帝時傳入我國，由於歷代統治者的提倡，至南北朝時期已極爲盛行，佛教大小乘經典也大量翻譯過來。隨著佛教的盛行，寺院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出家僧侶急劇增加。如南朝梁武帝時，尊佛教爲國教，僅京都一地就有佛寺五百餘所，